

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

郭志刚

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时期已经20年了，但长期以来人口研究对这种重大转变认识不足。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证实，以往严重高估出生水平和生育水平，低估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发展规划目标一再出现大幅落空。人口预测模拟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在21世纪中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人口规模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未来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极为关键的时刻，而以往人口理论宣传和估计预测中的偏向误导了对人口大趋势的正确把握，造成中国生育率严重过低，导致未来过度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风险。

关键词：低生育率 人口风险 少子化 老龄化

重新认识人口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已经发出的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时，党中央曾预见人口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党中央并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

作者郭志刚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8ARK001）的成果之一。

编者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保留了部分注释，全部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可登录本刊网页 www.ieronline.cn 查看，或与编辑部联系索取。

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经过30多年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态势得到了基本遏制，总和生育率多年来远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转变为负增长。尽管人口数量在今后很长时期中仍是下一步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但是人口与发展问题已经转向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生育率过低造成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问题不断加剧，日益突出。在这个关键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决策面临着历史性的选择。

面对当前的人口形势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判断，第二个问题是针对人口发展前景应采取的对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对实际生育水平陷入了一种迷茫状态。一方面，近20年来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口调查均反映出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然而却不断被质疑是由于严重的出生漏报所致，并通过种种间接估计将其调整到1.8左右，而这些间接估计却大多存在着技术方法错误或数据方面的缺陷，反映出严重的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第二个问题是针对中国人口变化前景应采取的对策。首先是未来的20至30年中应当选择的生育率水平，然而这个决策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人口更为长远的前瞻性研究之上。但是，以往基于那个影响极大而又并不可靠的1.8生育率判断和在计划生育方面过于求稳怕乱的心态，认为1.8的生育率最好再能继续维持20至30年才好。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长，而是生育率过低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少子化和过度老龄化。重新认识人口形势这项任务不仅极为重要，而且已经到了极为紧迫的境地。在中国人口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错误的判断和犹豫不决将贻误战机，危及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提供了最新的权威人口数据。本文将根据六普公布数据来检验以往一些主要人口统计和预测估计，借以揭示和分析以往人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重新认识人口形势的参考。

六普结果表明以往对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严重低估

六普公布的主要数据印证了笔者的上述判断。六普数据表明，中国总人口的增长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的水平，而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则又明显超出了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

从政府主管部门最近两个五年人口规划的相应人口预测结果来看，均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偏差问题。“十五”人口规划时的人口预测采用官方口径的1.8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远高于当时所有的调查统计结果。并且，该预测的人口基数还在2000年人口普查的12.65亿总人口之上又加上了约1700万的调整量，反映出政府主管部门并不相信五普结果，对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数另做了调整扩大。“十五”规划预测的2005年总人口为13.31亿，然而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取得的总人口结果却只有13.08亿。“十五”规划要求期间的人口增长不超过5600万人，然而2005年时，实际总人口数要比预测规划数少2300万，相比其人口预测所调整的2000年基期人口的12.83亿仅增长了2500万，而相比五普总人口的12.65亿也不过只增长了4200万。仅仅5年预测就有如此之大的偏差，已经足以表明该预测的人口基数调整与生育率参数假定均严重脱离实际。

“十一五”人口规划时的人口预测基数直接采用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人口数，但对生育率的设定依然照旧，该预测的2010年总人口为13.60亿。然而，六普公布的总人口数为13.40亿，即表明“十一五”人口规划又偏高了2000万。“十一五”人口规划预计平均每年人口递增1000万的局面根本没有出现，而实际上人口平均每年仅递增600万而已。于是，规划预计距离实际情况之间再次出现巨大偏差，又一次反映出以往对生育率的严重高估问题。

由于官方口径的巨大社会影响，高估生育率的偏向极为普遍地存在于前些年的绝大多数人口研究当中，进而误导了对当前中国人口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危险的是，这种状况已经延续多年，并且至今还占据着人口研究的主流地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误导了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也误导着政府的人口规划和决策。实际上，我们只要将以往的绝大多数人口预测结果与以往历年发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结果一做对比，便可以看到以往人口预测都普遍高估了出生人数和总人口数。

六普公布的最新人口年龄结构中镌刻着以往人口发展过程的信息，所以按六普结果的模拟分析可以将各种人口指标比较的视野扩展到以往20年。根据笔者按六普结果模拟出的以往20年的人口发展过程及相应人口指标来进行比较，其实甚至连历年统计公报公布的系列人口指标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高报了出生水平和人口增长，低报了人口老龄化程度。人口估计、统计公报和六普结果这三种不同的数字之间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关系：以往人口估计虽然都有一定数据基础，但往往反映出很强的主观偏向；统计公报人口指标来源于人口变动抽样调

查,但要做总体推断和统计调整,也会加入经验判断;而人口普查则是对人口大清点实际结果。按照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便能从不同统计数字中看出以往人口研究的问题。

图1显示出,与六普结果相比,1994—2005年的统计公报的人口出生数都明显偏高,尤其是1996—1999年最为严重,偏高均为400万左右,偏差率在24%~30%之间。从六普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算出,自1996年以后,年出生数已经降到1600万,其中好几年还不到1500万,甚至有的年份只有1400万左右。图中仅举近年最具有权威影响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估计为例,来反映以往人口预测中的通病。由于五普低龄人口数据遭到强烈质疑,该研究在开展正式人口预测之前必须先要作出对20世纪90年代的可接受的出生估计。从图1中的相应曲线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套估计大致以统计公报为基准,只是在前半段略高,在后半段略低。因此,这套出生估计的问题还是严重偏高,同时表明以此套估计为基础的人口预测尚未开始便已经注定严重有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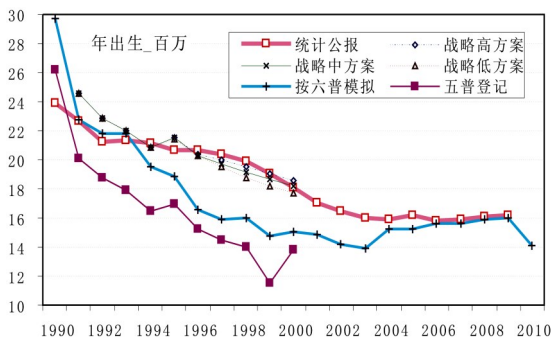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0年出生人数的比较

资料来源及说明:

- ① 统计公报: 为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出生人数。
- ② 战略高、中、低方案: 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上卷)》,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7年。
- ③ 按六普模拟: 郭志刚根据六普人口结构模拟的1990—2010年出生人数(郭志刚:“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6期)。
- ④ 五普登记:《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年。

此类问题在以往人口研究和预测中非常普遍,极少例外,就是因为以往人口研究中盛传30%出生漏报率的强大影响。然而,如此之高的漏报水平不过是以讹传讹,从未在全国层面得到过确凿的证实,不少证明这种“高漏报”的间接人口

估计却一再出现明显的错误和缺陷。但是由于有政府主管部门采信和发布，得以上下传播，左右社会舆论。正因为如此，六普公布的少儿人口比例极低，只有16.6%，表明我国人口的少子化程度十分严重，远超以往预期水平，使上上下下都感到十分吃惊。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图1表明这种少子化过程早已开始，也早现端倪，只是人们一味拒绝相信而已，反而基于一些不实的间接估计构建出一幅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人口图景。

上述六普模拟比较研究还表明，以往曾遭严重质疑的五普低龄人口数尽管的确存在一定漏报，反而相对更接近六普结果。这种情况表明，以往人口统计迷茫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数据质量问题，也不是技术方法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出了问题，宁愿相信主观经验判断，也不相信实际调查结果，因而在进行统计调整时宁高勿低，又缺乏科学根据和充分论证，导致了严重的过度调整。这种过度调整结果与不调整的结果的偏差方向相反，而偏差幅度甚至更大，导致更大的思想混乱，误导人口形势的判断和应对决策的制定。

总和生育率是研究当前人口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时极重要的一个指标。它的水平影响着每年的出生数量，也影响着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近20年来，绝大多数全国人口调查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均处于1.3~1.5之间，但政府主管部门一直坚守着1.8的总和生育率口径，以致政府部门所做的人口规划乃至包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口预测也大都依据1.8左右的生育率假定。

图2提供了不同来源总和生育率的比较，可以看到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都处于1.5以下的低水平，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总之，六普结果确认了以往全国性调查所揭示的极低生育率，而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坚持的1.8的生育率口径则严重脱离实际。至于那个曾经惊动了上上下下、刮起“生育反弹、形势严峻”之风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则被同期及以后的人口变动调查的结果、也包括六普结果所否定。这种结果印证了笔者对2006年调查数据的分析结论，即该调查生育率异常的结果是因为该调查样本严重偏差所致。^[1]实际上，近年我国人口生育率并无明显反弹，反而是人口老龄化先期而至了。然而，这股产生严重误导的风，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正本清源，还在影响着社会舆论和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

图2还提供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1] 郭志刚：“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2期。

只包括了研究课题所专门推荐的高方案和中方方案结果。这两个方案的总和生育率估计在前半段与政府口径几乎相同，在后半段则略低一些，2000年高方案估计为1.77，而同年中方案的估计为1.68。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这套估计与实际调查结果相距甚远，同样也被六普模拟结果所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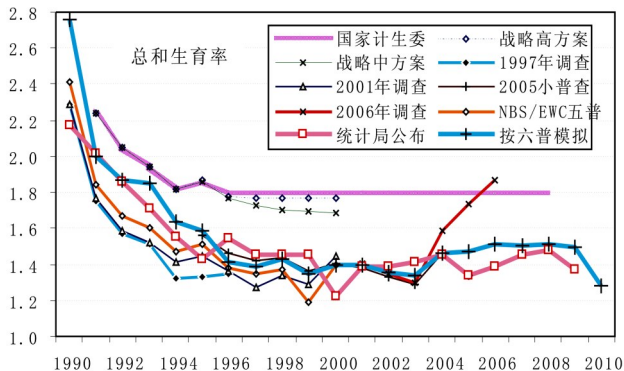


图2 1990—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

- ① 国家计生委：《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8）》，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年。
- ②③ 战略高方案、中方方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
- ④ 1997年调查：郭志刚根据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
- ⑤ 2001年调查：丁峻峰根据2001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
- ⑥ 2005小普查：郭志刚根据2005年全国小普查2‰数据样本估计并调整。
- ⑦ 2006年调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年。
- ⑧ NBS/EWC五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东西方中心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
- ⑨ 统计局公布：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1990—2010）。
- ⑩ 按六普模拟：郭志刚根据六普人口结构模拟的1990—2010年总和生育率（郭志刚：“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6期）。

高估出生水平和生育水平必然会导致低估人口老龄化。图3提供了六普数据所反映的以往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用来对比历年统计公报的相应结果，^[1]以及200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按总和生育率1.8的预测结果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预测结果。^[2]其中，六普模拟结果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在以前20年中大致呈线性的均匀发展。与之相比，以往历年统计公报公布的老年人口比例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995年起提供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从2006年起同时提供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

[2] “十一五”人口规划文本中没涉及人口老龄化方面，也没有找到相应人口预测数据。

除了两端年份还比较接近外，中间多年的水平都明显偏低。近几年来统计公报的老年人口比例呈加速提高其实并不能理解为是人口年龄结构特点使然，因为按六普模拟的结果中已经包括了年龄结构的影响，而且也包含了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影响，并且其描述的人口过程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统计公报的老年人口比例在近几年加速提高的特征可能反映的是统计部门在近几年认识到以往人口统计中的偏差，开始有意识地对有关人口指标加以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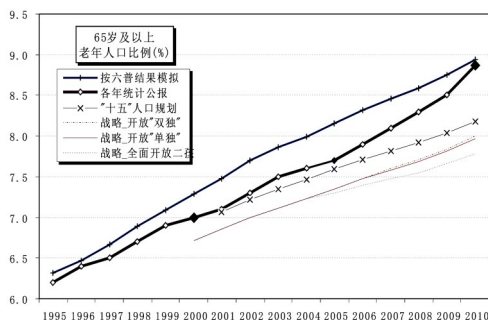


图3 1990—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比较

资料来源及说明：

- ① 统计公报的老年比例曲线中的菱形标志年份的数字来自于全国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
- ② 进行六普模拟时为了与各年度对应，取各日历年末的老年人口比例，因此2010年模拟结果略高于六普（即2010年11月1日）的结果。
- ③ “战略”代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预测，包括在2005年分别开放“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及“所有夫妇”生育二孩的三个方案。

相比六普模拟结果，2001年人口预测的老年人口比例则保持原有趋势不变，因此使偏低程度越来越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所做的人口预测虽然做得最晚，然而其中生育水平各方案（代表2005年开放“双独”夫妇、“单独”夫妇生育二孩以及全面放开生育二孩的模拟）的老年人口比例的偏差却比以前的预测还要更大。总之，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口预测中的老年人口比例仅仅在几年之内，便已经与实际情况差出约1个百分点。可以预期，如果以往人口预测中的偏差继续被视而不见，那么这种偏向对将来的人口老龄化的低估将会更为严重。

以上比较清楚地表明，以往高估出生及过分的统计调整严重地低估和掩盖了人口老龄化的真实水平，实际上是用主观猜测但实际并不存在的出生人口在统计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尽管笔者对六普的模拟分析发现，以往低估人口老龄化还有对人口预期寿命低估的原因，但是这种影响相对较小，远不能与高估出生

人数和生育水平的作用相提并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被严重低估，以往人口预测高估了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数量减少的风险，甚至在六普主要数据公布之后还有人这样说。然而，这种说法只是泛泛地提出推断结论，却从不列举几个有影响的人口预测的实例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种说法完全是沿用一种虚假图景来掩盖事实的真相，只能继续严重干扰对当前人口形势面对的主要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未来人口决策必须重新认真研究

我们之所以将新的人口时期称之为低生育率时期，是因为低生育率是未来人口变化的主因，决定人口进程的主要特征。

如果一个人口长期维持2.1的总和生育率不变，那么最终人口将成为一个不增不减的稳定人口。更替生育水平才是达到人口长期均衡的条件。但是任何一种生育率如果长期维持也都可以类似地推算出未来人口前景将如何。比如，可以推导其对应稳定人口的“内在的”增长率，以及“内在的”人口倍增时间或人口减半时间。如果长期维持1.8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形成的稳定人口将以每117年人口减少一半的速度来递减。企图长期将生育率稳定在1.8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一个好的人口战略选择。要是长期维持1.5的总和生育率，那么未来形成的稳定人口每54年人口就会减半。看起来生育率上的0.3的差距不大，但是却相当于枪口偏了一厘，人口后果会相差巨大。30年前，出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一些学者曾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8亿为好。由于以往面对的主要人口问题是控制人口规模的过快增长，这种追求人口规模缩减、认为人口越少越好的观点也因而得到广泛宣传。实际上当时人口学界对此争议很大，批评这种战略诉求只重人口数量，忽略人口结构，忽略社会因素。今天看起来，它也忽略了历史因素。中国人口确实多，但这是几百年的历史形成的，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人口多的问题也并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就能解决的，有待历史慢慢解决。想一蹴而就，其实无异于在人口问题上搞一次“大跃进”。人口发展战略思路问题在低生育率时期实际上更为重要，在此问题上的偏颇将会产生更直接的危害和损失。这两年又有人建议全国不分城乡搞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那就是1.0的总和生育率了，这种生育率的“内在”人口趋势是人口每20多年就会减半，更是一种无视人口发展规律、无视社会发展规律、无视历史发展规律的空想，误国误民，非

常危险。所以，实事求是地反映当前实际生育率、恰当地选择未来的生育率等问题就绝不再是一般学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

依据稳定人口原理做理论上的推导，并未考虑现有人口结构的影响，并不是真正的人口预测，也没有具体揭示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人口进程，但是它揭示了不同生育率下的人口远期趋势规律，是制定长期人口战略决策的参考标准。在此框架内重新审视那种将 1.8 的低生育率再维持 20~30 年的主张^[1]，便很容易看出其问题所在。第一，从以上对 1.8 的生育率的推导结果已经揭示出其将导致人口的很快缩减。第二，将这样一种低生育率再维持 20~30 年，这本身已经跨越了一代人的间隔时间，足以对人口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第三，六普数据揭示出，以往中国人口所经历的实际生育率比 1.8 还要低得多，而且已经持续近 20 年了，这种主张显然对长时期持续这样低的生育率从未给予考虑。第四，这种主张的基本思路主要还是为了控制人口的总体规模，回避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特点而造成的出生高峰，然而并未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综合影响。即便对此有所考虑，视野也不够开阔，只是考虑到 21 世纪中叶。然而，中国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从 1950—1990 年有三大出生高峰，年均出生规模在 2000 多万以上。他们之中年长者刚刚跨入老龄，而主要部分将在今后的 40 年陆续进入老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重度期是在 2050 年以后。所以，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必须将视野覆盖整个 21 世纪才行。鉴于以上原因，人口发展战略决策必须重新加以认真研究制定。

事实上，未来仍然保持 1.8 生育率为好的人口发展战略建议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认真研究和论证，只是简单说明这一目标生育率可以保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 2020 年 GDP 翻两番、人均 3000 美元的目标，还说这个目标生育率保证未来总人口不会超过 15 亿，此后总人口将缓慢下降，因此这个目标生育率不高也不低。而这些结果已成定数，所以保持 1.8 的生育率已经不再成其为理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宣布，中国在 2008 年便已经达到了 GDP 人均 3000 美元的目标。而这个经济目标的取得，除了经济本身高速增长超出预期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以往预测，即实际出生和生育率水平远低于以往判断。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即以往人口发展是在 1.8 生育率的名义之下行极低生育率之实，如果还认为这样的情况再持

[1]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 年。

续得更久才好，将会对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造成更大的损伤，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和谐都轻率地置于巨大的人口风险之下。根据六普结果推算，未来人口总量超限的风险已经很小，而未来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过度的风险却在迅速增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六普人口年龄结构宣示少子化和老龄化超乎以往的想法，另一方面大量调查研究揭示出群众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甚至不愿生育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的迹象。因此，能否使很低生育率有效提高并不见得像一些人想得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是政府主管部门只专注于严控生育率，因而这方面的实践几乎仍是空白；另一方面国际上其他低生育率人口的政府在此方面的努力几乎可以说是很失败的。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暂且先假定生育率“能够”如愿得到有效提升，然后基于六普人口年龄结构所做的人口模拟预测来判断在结合实际人口结构影响的条件下，不同生育率会有何种人口后果。

在六普人口结构模拟的基础上，假设未来四种不同生育率方案的预测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其中生育率的高中低方案均是假设从2012年起将当前的过低生育率在几年内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然后长期维持下去。

低方案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60，反映的是继续坚持在1.8生育率的名义下长期维持很低的生育水平，大致可以反映一些生育政策微调的影响。

中方案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反映的是认识到实际生育率已经过低，因而迅速、有效地将其提高到1.8左右，并仍认为1.8生育率最好并长期坚持下去。

高方案则是将当前的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94，反映的是完全放弃两个1.8的生育率口径，实行二孩政策并有效地将生育率提高到接近更替水平。

第四个方案先维持当前的低生育水平不变，从2035年起将生育率逐步提升到1.94并从此维持下去，它反映的是在实际极低生育率情况下仍坚持两个1.8生育率口径不变并加以实施。

如上所述，我们并不能确定一旦生育政策调整便真的能有效提升生育率，因此这四套预测模拟方案只是在假设可以做到的条件下为人口决策提供参考。但是，这四套模拟结果又不同于上述根据稳定人口原理所推导的不同生育率的后果。因为这些模拟结果中反映了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的影响，而这些结构影响对未来人口进程的影响非常大，同时这些模拟结果能更好地反映在不同生育率下的人口进程本身，而不是像稳定人口推导那样只是反映一种极长期地维持某种生育率的最终结果。

高方案的人口峰值在2030年达到14.93亿，而且在这一规模上维持的时间较

长，但是不可避免地转向人口缩减，到21世纪末总人口将不足13亿。中方案的人口峰值为2029年14.54亿，之后转为人口缩减，到21世纪末总人口不足10.5亿。低方案的人口峰值为2026年的14.23亿，之后迅速地转为人口缩减，到21世纪末总人口仅8.5亿。这些方案结果表明，只要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中国人口总量在21世纪中期以前转为缩减已是定局，但是不同生育率选择会使21世纪末的总人口规模从8.5亿到13亿，相差极大，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刻意追求人口过快缩减还是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推迟提高生育率的第四个方案结果在总人口指标上看起来似乎还不错，由于晚提升生育率30年，使前期总人口规模得以显著压低，而后期的总人口规模则介于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要是从人口递减的速度来看，它的结果将处于高方案和中方案之间。可能正是因为类似的人口总量图景导致了再维持较低生育率30年不变的政策建议，但是这种方案在其总人口规模上的表面收益背后却是其他方面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图4提供了各种方案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模拟结果，其基本特征是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的确不可逆转。当前中国不过刚刚跨入老龄社会的门槛，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是在2050年以后，并且到达高峰以后基本上就维持下去了，至多有一些波动。因此，与总人口指标不同的是，很难再用“高峰期”这种表达方式来形容高中低方案的老年人口比例指标。这个特点是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也可以说是以往的中国人口历程决定的。1950—1990年这40年的大规模出生队列目前仍基本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只是其中最早的一两个队列刚刚进入老龄，而绝大部分将在今后的40年中陆续进入老龄，所以就决定了未来老年人口负担有40年迅速增长阶段，这是中国人口发展新时期的新特点，也是未来人口决策需要应对的重中之重。忽视了这一点，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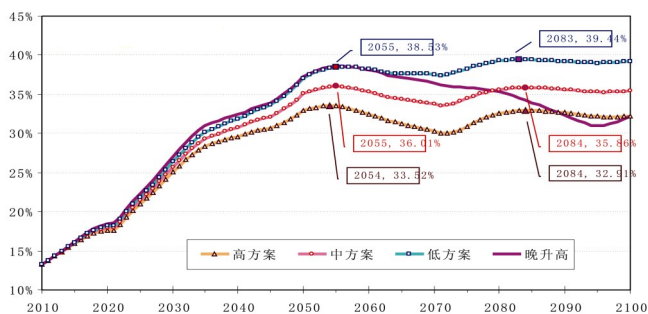


图4 2010—210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多方案模拟

图4同时表明，生育率越低则老龄化程度越高，这表明生育政策调整不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调整的老年人口比例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必须特别指出，生育率高、低方案之间相差幅度并非像有的人口专家说的那样只相差2个百分点！比较高、低两方案在21世纪中期老年人口比例的最大值（分别为33.5%和38.5%）便可以得知两者之间已经相差了5个百分点！这些人口专家之所以认为即使提高生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很可能是由于他们的预测用的还是1.8生育率的假设，所以他们所看到的差别只相当于图4中高、中两方案的差别，于是便会严重低估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

要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前景作出一个完整的描述，至少应该包括两句话：不论是否提高生育率都已经不可能逆转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然而能否提高生育率则能决定未来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差异。因此，片面地强调前一句而不提或淡化后一句，就会造成人口老龄化已不可缓解或已经不值得缓解的印象，自然会严重误导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至于2个百分点或5个百分点的老年人口比例差异算不算巨大，就是主观价值判断了。作为一个参照，这个指标一共不过100个百分点，中国已经跨入老龄社会，而当前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也只是13.3%，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程度差异则是处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重度期（30%以上）的差异，因而更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哪一个百分点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在于值不值得为了未来更快地缩减人口规模而付出更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代价。

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由于在提高生育率之前保持着六普揭示的当前仅1.5左右的低生育率，因此21世纪前半期其在老年人口比例上的水平甚至略高于低方案。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方案在21世纪后半期呈现出与其他方案不同的明显下降趋势，这并不代表晚30年才提升生育率有什么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神力，不过是由于生育率被提升得较晚，先导致21世纪中期的老龄化程度特别高，而后来提升生育率的影响也顺延了30年而导致的老龄化程度的相对下降而已。其实，根据稳定人口原理，这个晚升高方案在远期未来的老龄化水平将与高方案的水平完全相同，因此这一方案只会缩减总人口规模的收益，然而在降低老龄化程度方面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老年人口比例只是反映老龄化水平的一个指标，图5提供了不同方案的总抚养比指标的比较，它显示了将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合并起来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数量关系。先从高、中、低三方案比较，可以看到生育率提得越高，未来的总

抚养比就会越低。还能看到，这三个方案都在21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有两个高峰，其中低方案的第二峰值甚至还高于第一峰值，预示着低方案下的未来收敛水平要比第一峰值高，然而高方案则正好相反，表明未来总抚养比将不会再高于第一峰值。

如果我们将视野锁定在预测的前25年中，那么生育率越高、总抚养比越高。一些人以此作为反对调整生育政策以提高生育率的理由，说是在老龄化过程中再增加出生，将会使家庭和社会背上“两头沉”的负担。然而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它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口再生产内在规律决定了一个人口要不至最终消亡，那么或早或迟都必须将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及以上。换句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延续的必要条件是平均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那么，为了中华民族的延续，这种“两头沉”的负担必须要背，不可回避。至于什么时候来背就很有讲究了，要是在当前老龄负担不太重的时候推诿这副“两头沉”的担子，那么势必造成在未来老龄负担更重的时候还得同时接受增加出生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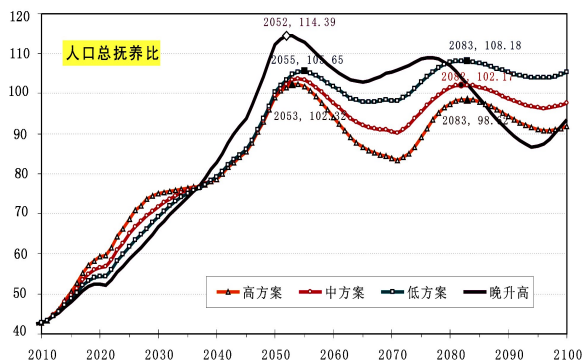


图5 2010—2100年人口总抚养比的多方案模拟

实际上，图5中推迟30年再提高生育率的方案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情况，它在2035年以前的总抚养比确实最低，然而后来却在老龄化更为严重的时期增加出生，两面夹击导致其总抚养比高得出奇。多年来人口研究与宣传中的那种偏向，使尽早提高生育率的“两头沉”问题的严重性被过分夸大了，然而正是尽早增加的出生才是未来缓解21世纪中叶严重老龄化的生力军。如果要推迟到2035年才开始增加出生，那么在2050年之前这些出生人群还全都是需要社会负担的少儿人口，不但起不到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反而增大了社会负担。因此，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实际上是在贻误时机，将导致未来面临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局面。

图5中反映出，该方案的总抚养比在整个2040—2080年期间过高。因此，这种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是万万不可取的！

图6以时间序列人口金字塔的直观图形更清楚地揭示各方案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各生育率方案在21世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高方案在21世纪末已接近于静止人口，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不大了。而中、低方案由于长期维持远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因而在21世纪末人口结构更接近于缩减型的稳定人口，即它们的人口转变并没有结束，而是将提高生育率至更替水平的任务留给了更远的未来。高、中、低三个方案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尽早并或多或少地提高了生育率，因而在2030年时前十几年所增加的出生已经开始陆续进入了劳动年龄，而在老龄化程度更严重的2050年时则有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之下，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在2030年时尚未动作，在2050年时新增出生仍是少儿人口，于是便导致21世纪中期总抚养比特别高，即严重的“两头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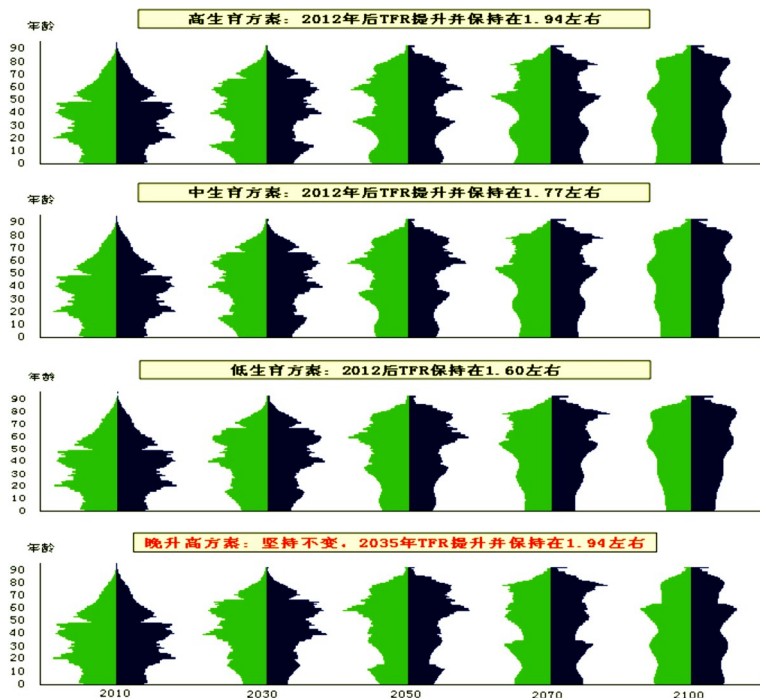


图6 2010—2100年人口金字塔的多方案模拟

尽早提高生育率的方案不仅为未来社会经济运行提供较多的劳动力，而且也同时为未来的人口再生产提供较多的育龄妇女。图6显示，高、中、低方案在

2030年时均已形成人口金字塔底部的一个或大或小的凸起，实际上是在当前极低生育率情况下不同程度地挖掘了2010年人口金字塔中育龄妇女的生育潜力，或多或少“扭转”了业已存在20年的人口少子化趋势。但是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则视这种“扭转”是对未来人口发展不利的“出生高峰”而刻意加以回避，因此最终贻误了调整生育率的最佳时机。但是到了它认为调整生育率的最佳时期时，育龄妇女数量已经是每况愈下了。即使如此，在随后的老龄化重度期，它还得再挑起少儿人口比例提高的另一副重担。相比4个方案2050年的人口金字塔，便能看出这个方案挑起“两头沉”重担时的中段劳动年龄人口之相对薄弱，这便是推迟30年生育率提升的巨大代价。与此类似，推迟20年还是推迟10年再提高生育率都有同样的特点，只是程度有差别而已。

总之，人口负担“两头沉”的问题其实是急刹车式的计划生育和极严的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转变中固有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如果在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已经20年的今天还要以此为理由迟迟不做出相应调整，将造成人口控制过度，并导致计划生育悖离其初衷。以上的人口预测分析表明，推迟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并不能真的避免“两头沉”人口负担问题，只不过是将此问题推到了未来，使我国人口老龄化在最严重的阶段雪上加霜，换取的只是21世纪前半段总人口规模和后段老年数量及比例方面的表面收益。这种对策建议不利于我国人口转向长期均衡发展。

再次重申，以上人口预测都是在“一旦需要，生育率便能有效提高”的假设前提下作出的，但是现有很多相关研究已经揭示出，群众的理想子女数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相当比例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夫妇却自愿放弃二孩生育，甚至一个孩子都不想要的比例也在提升。所以，即使在当前，这个假设前提很可能已经脱离实际，更不要说再将很低生育率再维持3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当前的人口判断和决策决定将来如何应对老龄化

实际调查数据已经多次揭示出以往严重高估了出生水平和生育水平，揭示出以往的人口预测明显低估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并且人口发展规划目标一再出现大幅落空。出于思维定式，这些差距总是以出生漏报为理由搪塞过去，对新时期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认真和深入的研究，甚至对那些已经很明显的错误也不加以修正。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再一次证实了生育率长期过低，反映出人口少

子化和老龄化加剧，同时六普数据也是对以往人口研究结果的重要检验，可以充分反映出以往人口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以往人口研究偏向问题的真正严重性主要并不在于其估计偏差幅度较大，而是在于这些偏差产生了方向性的误导。不仅没能及时揭示今后人口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与任务，并及时制定决策正确地加以应对和解决这些矛盾，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拖延，导致继续加深矛盾。本文根据六普数据的人口预测模拟揭示出，只要未来的生育率不超过更替水平，那么我国总人口规模未来将处于下降趋势，21世纪内总人口将减少几亿人。然而，未来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老年人口比例和人口总抚养比将达到人类史无前例的程度。因此，中国人口在21世纪中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人口规模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虽然中国刚刚跨入老龄社会，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有所感受，而且将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个重大转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周期长、惯性大，我们必须及早认识到人口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由此决定的人口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人口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变化。

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时期已经20年了，而生育率迷茫也持续了近20年，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极为关键的时刻。以往急剧的生育转变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十分畸形，必须要认真和切实地应对迅猛的人口老龄化，才有可能转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指出，由于囿于以往人口理论宣传和估计预测中的偏向导致对上述人口重大转变认识不清，贻误时机，迟迟不能作出正确的应对决策，导致未来过度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危及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危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兴。本文在六普数据基础上以多方案预测模拟结果可以证明，能否尽快转变旧的人口观念，制定正确决策，有效提高生育率是能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如果继续忽略人口老龄化这个真正的人口风险，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甚至采取相反对策去加剧这个人口矛盾，必将铸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是中国未来的人口问题能否解决好，尤其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则取决于现在的判断和决策。^[1]